



发改委谈信用体系建设

多部门协作 联合惩戒

3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其中包括要规范信用“红黑名单”的退出机制和异议处理机制。

在回答“如何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守信者一路绿灯”问题时,张勇说,目前,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已经形成,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也已与44个部门、所有的省区市以及60多

家市场机构建立了互联互通,实现了信息披露、信息公示以及异议处理和联合惩戒等功能。到现在为止,已经累计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机票900多万人次,购买火车软卧、动车组列车车票等300多万人次。6000多户企业被限制融资授信和获得政府资金支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虽然全面发力时间不长,但是作用很大,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欢迎。”

张勇指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处于初期阶段,需要不断完善。

针对“红黑名单”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张勇表示,要规范“红黑名单”的退出机制和异议处理机制。

张勇说,下一步要不断健全完善法规制度、标准体系,进一步提升信用信息共享公开水平,加大联合奖惩力度,并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形成全社会守信重诺的氛围。 据新华社

张伯礼代表建议

医疗诈骗 亟待重拳整治

以“抗癌降糖神药”噱头假冒知名医院专家坐诊,骗取老年人信任;假借国家扶贫名义以看病报销药费为托,诱导老年人上当……一段时间以来,医疗诈骗事件时有发生,不仅给患者造成经济损失,更延误了病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建议,有关部门应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力度协同打击医疗诈骗,让不法分子受到应有惩处。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来,中医科学院收到受骗信件75件,受骗金额少则数千元,多则高达125万元,累计金额390余万元。据张伯礼说,这仅是冰山一角。很

多患者不仅损失了养老钱、救命钱,还可能延误或加重病情。

张伯礼说,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一方面老年人患慢性病的风险增加,老年人对健康服务的需求提高;另一方面他们对健康知识了解不够,获取信息渠道不畅,也缺乏对假冒医疗广告和非法医疗活动的辨别能力,这给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导致许多老年人蒙受损失。

与此同时,虚假医疗广告也成患者一大痛点。近年来,一些夸大其词、虚假宣传的医药广告“牛皮吹上天”,虽然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打击力度,但仍有消费者频频“入坑”。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国受理“医药及医疗用品类”投诉共1954件,其中涉及虚假宣传的有485件,占24.82%。

张伯礼表示,有关部门应完善政策,一方面遏制虚假广告的发布;另一方面应加强对电视、报刊、网络、自媒体医疗广告监管,制定严格规范的登记、审核、备案、惩罚制度,同时加大部门协同打击力度,加强综合治理。同时还应提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治疗疾病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不要盲目参加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知识讲座、专家报告等,切莫病急乱投医,导致上当受骗。 据新华社

委员热议“补习学校热”

孩子是否需要“两个学校”

“我发现如今有两个教育系统:一个是公办、民办等学校组成的系统;另一个是补习学校,从补习数学、英语等课程到培训书法、钢琴等特长。补习学校如此盛行,我觉得有些不正常。”3月5日下午,北京铁道大厦,政协无党派人士讨论会上,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委员快人快语。

杜卫说,1日他来北京的路上,随机问了些人,这些人都说,如果自己的孩子不上补习班,学习就跟不上。

“我一听以后,更加紧张了。这个情况,光靠一个教育主管部门来改革,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培训机构是工商注册的,这成了市场行为。”杜卫援引浙江当地的报道举例,一些培训老师的年收入已达200万元。

“有些家长为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送孩子到补习班。有些家长为了图省事,把孩子送去补习。但严重的情况是,有些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

到位,到另一个课堂,再收一笔钱,才能讲到。所以,就出现了孩子不补习、学习跟不上等情况。”杜卫说。

“孩子基本从星期一忙到星期日,从早晨忙到晚上。哪怕寒暑假,不少孩子从学校的课堂出来,又进了各色培训的课堂,孩子接触社会、家庭沟通、亲情培育等问题被忽略,他们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一定影响。”杜卫说。

“这个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关系下一代成长,不能回避。虽然教育部门也下过不少文件来治理,但我认为一定要综合施策才行。”杜卫说。

杜卫抛出的话题,随即掀起讨论高潮:

“补习教育现在是一个大产业,很多人想分一杯羹。”有委员接话。

“杜委员对这个现象的描述非常精准。我是家长,知道得比杜委员还直接!”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委员说。

“你孩子培训一年花多少钱?直接一点。”旁边一委员追问李稻葵。

李稻葵回答说,虽然不清楚具体多少钱,但知道孩子花了很多精力,确实存在两个系统、两个学校。

“如果不允许开补习班,它们会转变形式,转到地下或家里。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升学标准过于单一。”李稻葵分析,如果把考核标准变一变,让补习考高分变得没用,补习热就会退下去。

小组讨论结束,走出会场的李稻葵被记者们团团围住。当记者问他作为清华大学教授,想挑选什么样的学生时,李稻葵说: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孩子,应有远大的理想、好的心态,还要有好的健康和情绪管理能力。学习成绩可能短期内不行,但只要理想,愿付出,一定能成长起来。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希望。

据新华社



“说理”当成依法执法标配

□杨玉龙

乱处罚、不公平处罚等行政处罚乱象一直被百姓诟病。近日,太原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将通过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改进行政执法方式,促进太原市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其中,将倡导文明执法,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和说理式执法。(《山西晚报》)

“说理式执法”至少而言有三大好处。

一是有利于提高依法执法的水平,尤其是对执法机关而言,未尝不是对执法能力的一大考验,更是对执法能力提升的倒逼。因为,要能够做到“全程说理式执法”,唯有执法者自身吃透相关法律条款,在执法时才会胸有成竹,为被执法对象“说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是从被执法对象角度而言,执法人员“说理”的过程,不仅是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更是明晰自己合法权

益的过程;如此,既可以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也可以由此避免类似的错误再发。事实上,执法机关若能够设身处地做好“说理”,未尝不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谅解、信任与支持,一些执法冲突也就往往能够避免。

三是“说理式执法”也是一种透明执法,更有利于执法的公正。这样的执法模式,围绕行政执法重点环节开展说理式执法,讲清事理、法理和情理,与向民众千巴巴地灌输法律知识相比,更接地气;尤其是对旁观者而言,“说理”的方式,更容易消解由执法过程造成的误解,甚至是引发的舆论效应,而所产生的普法效果更直接,也更容易让人接受。

总之,在法制越来越完备的当下,更需要执法的规范性。可以说,“说理式执法”既是文明执法的彰显,更是规范性执法的必然要求。因此,对于执法机关应该给予重视,并将“说理式”当成依法执法标配,以提高行政执法的说理力和公信力。



安装监控视频要有分寸

□于立生

日前,杭州萧山区姑娘“逗比小情绪”发帖说:“隔壁装了6个监控,且都还装在最高处,现在每天都不敢拉开窗帘。”无独有偶,去年年底,徐先生也在家门口安装了一套监控设备,摄像头能360度旋转。几天后,邻居陈女士就上门要求拆除,认为摄像头可以照到她家人员进出及开门后家中情况,侵犯了隐私权。(新华网)

基于防盗及家中老人、小孩看护之需,小型监控视频设备进入千万家。但监控视频的安装,也不能因装在自家领地,就想怎么装就怎么装,也得注意分寸。

监控视频的安装,摄像头所对的方向,无非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对向了他人家的窗口、门口,延伸到了他人私域。他人在家中的活动情况甚至包括换衣之类,都给拍摄下来了,这当然侵犯他人隐私权。

第二种则是徐先生所称的,摄像头所对的是楼梯口之类公共区域。但既为公共区域,就并非徐先生一家的,不应由老徐一家说了算。如果过往的只是匆

匆过客,他们不会对此问题敏感;但日常在此进进出出的却是左邻右舍,特定人群,也就难免对此问题在意。

第三种情况则是摄像头对向的只是自己家中,或者门口、窗口之类自家区域的延伸部位,这当然绝无问题。

众所周知,公安机关在道路等公共区域安装了视频监控,此外一些企事业单位也按公安机关要求安装了视频监控,这都属于公共视频系统的范畴。但如若有人因失窃等紧急情况需要查询,一是得履行身份证登记的前置手续,二是只许查阅,不得复制、调取。这就是为了避免相关视频被不当扩散传播,侵犯到他人隐私权的情况发生。与此相对,市民所装小型监控视频设备,则属民用的范畴。但同理,需要提醒的是无论拍摄了什么,只要涉及他人(违法犯罪分子除外),也不能擅自随意扩散传播,以免侵犯到他人隐私权。

在民众隐私权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其实,只要安装者能多点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意识,注意群己界限,考虑下别人的感受,安装时有点分寸感,那么,就完全可以避免邻里矛盾、纠纷的发生。